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六七期 ——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9c)

【沧桑纪事】	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五)	陈小津
【史海钩沉】	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钱 江
【读史论衡】	道德原则冲突下的囚徒困境	董国强
【书 评】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舒 崇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 (二十)	舒 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沧桑纪事】

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五)

• 陈小津 •

◇ 三位大家的苦难

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上海各界许多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我也耳濡目染，与很多名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例如中国文坛巨匠巴金。我们家住在武康路 117 号时，与住在武康路 113 号上的巴金家仅有二三十米，我经常在路上与巴老不期而遇。其他在上海的著名艺术家，如京剧泰斗、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也都是我十分敬仰的大家。

“文革”中，与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一样，各界知名人士也成了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的重点对象，几乎无人幸免，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仅以巴金、周信芳和贺绿汀三位大家的受难经历，来揭露这些知名人士在“文革”所遭受的深重劫难。

周信芳从 7 岁就登台演戏，艺名“麒麟童”，青少年时代便饮誉大江南北。他一生中演过近

六百出戏，创作、改编了两三百出戏，成功创造了一大批经典的戏剧人物形象。他主演的《打渔杀家》、《徐策跑城》、《追韩信》、《乌龙院》、《四进士》等剧目，成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从五十年代起，周信芳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职务。1959年，年届64岁的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同年，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之托，主演并导演了倡导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京剧《海瑞上疏》，在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引起了轰动。

周信芳及夫人裘丽琳在三十年代曾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们对当时化名为“蓝苹”的江青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从1963年起，以“文化旗手”自居的江青到沪搞“文艺革命”，其中《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是她主抓的两出样板戏。周信芳对江青从不阿谀奉承，对她到处插手“摘桃子”、窃取别人创作成果的行径也十分看不惯。在创作“样板戏”方面，周信芳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例如，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都给主要演员安排很多大段唱腔。1965年，江青下令上海京剧院停下锣鼓，单打一地搞这两出“样板戏”。身为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严正提出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睚眦必报的江青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信芳的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意与他这样的人坐在一起。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经周总理亲自提议而担任了大会顾问的周信芳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京剧革命作出过的一些尝试。这篇文章拿到张春桥那里，没想到他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跟着江青鞍前马后搞“文艺革命”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刊出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点了《海瑞上疏》的名。随后，张春桥窜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山》为名，当众讨伐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人民请命的“万民伞”。1966年2月12日，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解放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把《海瑞上疏》说成是“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诬称《海瑞上疏》“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5月26日，张春桥又指使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的文章，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这三篇文章把周信芳抛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周信芳压来，他被责令交待问题。6月中旬，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周信芳的文章，诬蔑他是“反共老手”、“京剧界的南霸天”。

8月22日，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一群红卫兵造反派到长乐路的周信芳家里抄家。周信芳的儿媳敏祯遭到毒打，昏死过去。造反派抓到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把她的一头短发剪成“牛鬼头”，玫玫从此被逼疯了，后来被收进上海市精神病医院。周信芳和儿子回家后，造反派在周家开起了批判会。周信芳面对造反派的逼问，只是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共产党员！”造反派随后在周家乱打乱砸，把他穿着戏装，与周恩来总理、陈毅陈老总的合影统统撕得粉碎，还用墨汁在墙上涂上“打倒周信芳”的标语……

“一月风暴”中，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游街示众”。他胸前挂着写有“反动权威周信芳”的白色大牌子，其中“周信芳”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红色的“×”。周信芳被造反派打得口鼻流血，脸上青紫一片。此后，他被关进了“牛棚”，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打骂。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质问周信芳：“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周信芳回答：“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造反派说：“你演《海瑞上疏》，还不是反对毛主席？”周信芳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自己硬要把嘉靖皇帝跟毛主席扯在一起，这是你们的反动，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啊！”

造反派被说得恼羞成怒，对周信芳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周信芳与夫人裘丽琳数十年来患难与共，感情深厚。裘丽琳自己多次被造反派拉出去殴打，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可是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她还对女儿说：“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不然他们要打死你父亲的。”有一次，裘丽琳与其他几个文艺界的女“牛鬼蛇神”被一伙造反派拖上卡车，押到西藏路的一所中学里。几个造反派把裘丽琳拖进在一间空教室里，没问她一句话，抡着木棍和铁管就是一顿乱打……还有人把裘丽琳背到背上，像甩口袋一样一次次地从头上摔出去，直到她昏死过去。临近半夜时，家人发现裘丽琳蜷伏在楼梯底下。她的头脸已经肿得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鲜血从衣裤里渗出来。裘丽琳从此卧床不起。

周信芳的儿子周少麟先是关进“牛棚”，在木工车间劳动改造，后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

1968年11月14日，经张春桥亲自批准，73岁的周信芳以“三反分子”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进了少年犯管教所，与我母亲关在一地。在狱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审问，写交代材料，但他始终不屈服。他戴着1600度深的眼镜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密密麻麻地写下心得体会。有一次，有个专案组人员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上来就拍桌子，破口大骂。可周信芳不慌不忙，冷冷地问旁边的人：“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1969年，周信芳和周少麟先后被释放回家。而此时，裘丽琳已经病逝。家人就瞒着周信芳，说裘丽琳正在住院，不让他去探望。周信芳很快觉察到其中的变故，但并不追问，不再提起夫人，只是经常面壁而坐，痛哭饮泣。转过年，周少麟因看不惯江青一伙在报上大批夏衍及《赛金花》，私下对人讲起江青三十年代曾争演赛金花失败的不光彩历史，第二天就被拘捕，并以“防扩散”的借口判处五年徒刑，押到安徽劳改农场服刑去了。但是，这些灾难和变故并没有击倒周信芳。他对儿媳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就周信芳、巴金等上海文艺界几个头面人物的定性结论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参照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对他们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解放”。报告递上去，张春桥十分震怒，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对周信芳、巴金这样的人，不枪毙就是宽大了。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是反革命了。”张春桥的这个批示在上海流传开来，也传到了周信芳的耳朵里。张春桥一伙最后给周信芳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宣布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周信芳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个结论！”宣布结论的人怒气冲冲地离开后，周信芳仍然平静地埋头读书，时而轻声哼起《徐策跑城》中的一段唱：“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1975年春节过后，周信芳终于盼到了儿子周少麟刑满释放，但此时他已经80岁了，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山医院。3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信芳含冤病逝。这位“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要好好地活下去”的艺术大师眼巴巴地等待着还他清白的一句话，但没等到。他的遗体抬出病房时，住院的病人闻讯纷纷跟在后面送行。

1978年8月，上海市委作出为周信芳平反昭雪的决定，并于16日举行了平反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同样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的上海市文联主席巴金，声泪俱下地为老朋友致了悼词。

巴金比周信芳年轻近十岁，两人早在三十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已相识，解放后长期在上海负责文联的领导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曾一同远赴前线慰问志愿军，友情非同一般。

早在三四十年代，巴金就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大家了。他创作的《家》、《春》、《秋》的“激流三部曲”和《雾》、《雨》、《电》的“爱情三部曲”，成为中国几代人爱不释手的优秀作品。他一生笃守“说真话，做好人”的人生信条，尤其在历经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悲惨岁月后，他更加强烈地呼吁人们讲真话，一如既往地感动人民。巴金晚年的一个梦想，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希望人们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重演。

巴金说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十年“文革”中“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他曾回忆说：“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

“文革”一开始，全国的知名作家大部分靠边，巴金也在其中，他预感到自己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大革命”中在劫难逃。1966年8月，他刚在机场送别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由人变成了“牛”。他先是被编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一个创作组里学习，组长是一个工人作家。同在作协分会的叶以群8月2日跳楼自杀了，巴金不知老友已死，在批斗他的大会上被迫跟着人们喊“打倒叶以群”，什么也不敢想。同在作协分会的孔罗荪被揪出来了，造反派要巴金写揭发他的材料，巴金不会编造，只写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造反派不满意，于是揭发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越来越多。造反派到处散发巴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巴金的大标语，在马路边竖起对巴金的大批判专栏。被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点名批判后，巴金又陷入抄家和揪斗的风暴之中。

有一次，巴金正在作家协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上中学的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用鞭子抽打巴金，要巴金带他去自己家里接受抄家。这个红卫兵不知道巴金是干什么的，只听说他是“坏人”。巴金被打得只能拼命奔逃，非常狼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出现了，拉着巴金到大厅去给外地来串连的学生“自报罪行”，那个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了。

那几个月里，巴金白天在作协分会，一天几次地被外地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又一批翻墙入室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们。他每天靠服药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夜晚一听到捶门声就浑身发抖。

张春桥一伙篡夺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后，巴金被扣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多次在上海杂技场等电视批斗大会上接受批斗，挂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杀气腾腾的造反派叫嚷着要“砸烂”巴金的“狗头”，而巴金自己也不得不跟着举手高呼“打倒巴金”的口号。巴金还被揪到工厂、农村、学校游斗，后来又被宣布“隔离审查”，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他回忆说：“十年浩劫的头几年特别可怕，我真像一个游魂给带去见十殿阎王，过去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全给揭发出来，让我在油锅里接受审查、脱胎换骨。十幅阎罗殿过堂受审的图画阴风惨惨、鲜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代’，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在反思这场人间悲剧时，巴金仍感到自己的心在出血，对那个“由人变兽”的年代不堪回首。与他同时代的老舍、赵树理、杨朔、海默等很多杰出作家没能逃过劫难，而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办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

对巴金打击最大的，是他夫人萧珊的悲惨去世。因为被诬为巴金派到《上海文学》的“坐探”，萧珊也进了“牛棚”，成了“牛鬼蛇神”，被罚扫马路。有上学的小孩见到她，骂她是“巴金的臭婆娘”。当时造反派让萧珊清扫武康路、湖南路一带的马路。我有好多次经过武康路、湖南路的时候，总能见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在弯腰扫地。她那清瘦的背影与我母亲很像，我每次见到她时，总想起我的母亲。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仍然难受不已。

有一次，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进来“抄家”，萧珊为了保护巴金，害怕他被揪走，就偷偷跑到街对面的派出所请民警干预。派出所当时只有一个民警，不敢管。恼怒的红卫兵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抽打萧珊。她被打得左眼乌青，押回来与巴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在巴金“日子难过”的日子里，她也跟着挨斗，但她情愿多受一点精神折磨以减轻巴金的压力。她一天天憔悴下去，终于病倒了。当时巴金正在奉贤“五·七”干校接受审查。有人劝萧珊打电话找巴金回来，萧珊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巴金从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巴金想给夫人好好检查一下病情，但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医生或实习医生随便开点药就把他们打发了，连拍一张肠部的X光片都办不到。假期满后，巴金又请了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情日趋严重的夫人。但请假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当巴金再次要求延长假期时，单位里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巴金第二天就回到干校。巴金的女儿、女婿也向那位头头求情、解释，但是他严词拒绝，还说巴金“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巴金只好第二天回干校了。

萧珊后来靠一位亲戚的帮忙两次“开后门”，才拍了片子，查出患的是肠癌，且早已经扩散了。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但她只活了三个星期。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开恩”，在萧珊入院前一天，允许巴金回了家，让他有机会陪伴夫人度过最后一段生命时光。萧珊去世后，巴金一面拍着紧裹着她遗体的人形白布包，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

“世纪老人”巴金一直到2005年10月去世时，都始终把夫人的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仿佛两人从未分离过。孩子们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二老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向东海。

贺绿汀是从“文革”这场劫难中顽强地幸存下来的又一位上海杰出的“世纪老人”。巴金主张“讲真话”，贺绿汀提倡“干实事”。巴金享年101岁，贺绿汀1999年4月去世时已经是96岁高龄。

贺绿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暴动，二十年代末坐过两年国民党的大牢，“七七事变”后相继在大后方、苏北根据地和延安从事革命工作。他的成名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开创了西洋音乐“中国民族化”的先河，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音乐人才。

贺绿汀与“四人帮”一伙的交锋，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江青来上海蓄谋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十足音盲的姚文元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文章，散布“防修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谬论。敢于坚持真理的贺绿汀对这位随心所欲地乱打棍子的年轻“批评家”很看不惯，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严正而善意地要求“批评家”不要强不知为知，并指出了姚文元文章中的十多处错误。贺绿汀说：“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点功夫，实事求是，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此文一出，一片哗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江青一伙以“学术研讨”为幌子，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为阵地，对贺绿汀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围攻。

1966年“文革”大幕拉开后，江青一伙控制下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借用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的名义，仿效聂元梓等人炮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腔调，于6月8日开始“炮轰”贺绿汀，说“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天后，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文化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随即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们争相揪斗的“革命对象”。他的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家中所有生活用品、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连贺绿汀从国外给女儿带回来的一个洋娃娃，竟也被捅上几刀，开膛破肚。“打倒”的标语，从床头一直贴到大门口。

有一段时期，贺绿汀和同是老共产党员的夫人姜瑞芝不堪造反派的骚扰和纠缠，每天一大早就乘公交车躲进西郊公园，直到天黑才敢回家。可是有一天晚上，夫妇二人还是被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造反派抓到了学校。造反派用皮带打得两位老人鼻青眼肿，还逼迫他们跪在教室里，给他们剃了阴阳头。批斗快结束时，这些造反派用浓浓的墨汁泼在他们身上，高声叫着：“瞧！这对黑帮！”

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失去人身自由。姜瑞芝与两个女儿躲在家里，晚上不敢开灯。岁末寒冬的季节，家中被抄得只剩下有一条破棉絮，母女三人只好紧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御寒。很快，姜瑞芝也失去了自由，与丈夫一起被游斗、隔离。

贺绿汀被囚禁音乐学院期间，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逐一剖析，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贺绿汀这一勇敢的举动激怒了丑恶势力，也遭到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张春桥一伙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1968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两周后，贺绿汀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对贺绿汀的遭遇十分同情。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十分恐惧，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所谓的“贺绿汀翻案集团”，并成立了专案组，以此加强对贺绿汀及其亲人的迫害。他们把贺绿汀的次女贺晓秋、三女贺元元以及贺元元的男友叶华利软禁在学校里审问，派专人监视。贺晓秋曾独自跑北京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失望而归。学院革委会据此诬陷贺晓秋是“反动学生”，逼她交代是否帮贺绿汀递送“翻案书”以及发表过“攻击江青”的言论。我当时也被打成“反动学生”，造反派以“攻击中央文革”的罪名把我关进了交通大学的牛棚。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还就贺晓秋的问题专门向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诬陷说贺绿汀及其亲人等在组织“翻案集团”。徐景贤4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案十分重要，是一个十足的翻案阴谋，请上音革委会查清后，好好开一次电视斗争会，同时在报上揭露，工作要做得扎实一些。”

徐景贤的恶毒批示很快制造了一幕幕新的人间惨剧。姜瑞芝被诬陷为“翻案集团”的“罪魁祸首”，后来又被定性为“叛徒”，关进了少教所。三个女儿都被定为“翻案集团黑干将”，受到“隔离审查”……专案组人员4月4日拿到徐景贤的批示后，加紧了对贺晓秋的审讯，并拿出批示内容恐吓她。4月7日，贺晓秋趁看守她的红卫兵不注意，逃回家中，开煤气自杀，刚刚大学毕业就走上了绝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竟先后波及株连了多个地区的30多人，除逼死1人外，还逼疯1人，致残4人，隔离批斗20多人！

4月25日，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紧锣密鼓准备的批斗“贺绿汀翻案集团”电视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在会上，倔犟的贺绿汀针锋相对地当众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无耻造谣，迫使张春桥不得不中途叫停电视直播。会后，贺绿汀被毒打一顿，戴上手铐坐牢。

贺绿汀在狱中多次受到严刑拷打，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但他坚强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他每被提审一次，就会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白。一次，他对提审人员说：“你们把我关在屋子里打，我没有办法。但要开大会和群众见面，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敢把我写的几十万字的材料公布于众吗！”看管人员打他，他就大声喊：“×××打人喽！”关在同一幢楼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就是通过这个喊声，知道那边关的是贺绿汀，而且他还没有屈服。

张春桥曾说过：“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贺绿汀关在少教所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他。可当周恩来总理多次追问贺绿汀的情况时，张春桥却装聋作哑。幸运的是，贺绿汀有个曾是毛泽东的多年同班同学的三哥。正是因为三哥进京面见毛泽东求情，他才于1973年1月24日懵懵懂懂地走出了关了五年的少教所。当得知心爱的次女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受尽无数折磨也不曾落泪的贺绿汀顿时放声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四人帮”在上海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

## 【史海钩沉】

### 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 钱 江 •

1966年5月18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拼将一死，与已经来临的“文革”抗争。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社悄悄传开后，人们都极为震惊。但是，邓拓之死没有使“文革”恶浪有丝毫收敛，这个“潘多拉盒子”已经被打开了。

#### ◇ 陈伯达煽动要“揭竿而起”

就在邓拓愤然辞世的同一天（5月18日）下午，陈伯达找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陈首先向王揖询问：外界已经对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批评了，报社内部的反响如何？陈伯达强调，外边对你们人民日报社已经有了一点压力了，但你们内部没有动，还是一潭死水。

王揖说：编辑部同志感到很沉重。

陈伯达说：有什么沉重呢？沉重，又不动？你们要内外夹攻，要学陈胜、吴广。陈伯达在短短的谈话中，至少两次谈到，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呢？王揖理解，这是指要造总编辑吴冷西的“反”。

陈伯达追问王揖：你们副总编辑中有没有不同意见？你批评过吴冷西没有？陈伯达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际反修斗争，容易接受。国内、党内的反修，反到自己身边来了，往往下不得手。”

陈伯达的谈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从性格特点上看，陈伯达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如

果不是摸清了领袖的底牌或是得到授意，他绝对不敢发出这样的信号。

王揖和陈伯达早年在延安相识，听了陈伯达的话大吃一惊。5月19日上午，他找到副总编辑胡绩伟，激动地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几年来没有当过叛徒，对党忠诚，现在也是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如果有一点就是背叛。

胡绩伟一听非常诧异，问：你怎么说这些话？

王揖告诉胡绩伟，陈伯达找他去谈过话了，但是他不能说谈话的具体内容。从自己的感觉来说，现在他认为报社应该革命，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胡绩伟大惊，问道：起来革谁的命？

王揖回答：这个不能说，你要仔细体会。

胡绩伟追问陈伯达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且不愿意相信王揖说的是真的。他认为，吴冷西一倒，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肯定在劫难逃。

王揖坚持不肯说，两人不欢而散。

#### ◇ 围绕吴冷西展开的话题

胡绩伟是1965年春天去北京郊区房山县五侯公社搞“四清”运动的，已经搞了差不多一年。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出了大事，吴冷西吩咐秘书打电话要胡绩伟立即回报社，并且派车把他接了回来。胡绩伟以比较“局外人”的身份，开始处理乱成一团的社务。

王揖找胡绩伟谈话的当天（5月19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编委扩大会议，总编辑吴冷西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产生和修改过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当前的中心，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吴冷西告诉大家，要再开一次编委扩大会议，自己作检查。

作为老资格的干部，王揖看出形势相当险恶：吴冷西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弄不好，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也会被牵连进去，而现在大部分编委成员还都支持着吴冷西，就使形势更加险峻。

当天晚上，思前想后，王揖怎么也睡不着。20日凌晨2时许，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表示经过深思，要向他转告陈伯达谈话的全部内容。

20日上午11时，王揖找到胡绩伟，说：陈伯达认为现在的人民日报社一潭死水，按兵不动，应该“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来革命。

王揖告诉胡绩伟，谈话的时候王力也在。王力说，不仅要清算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

下午，胡绩伟召集编委成员陈浚、安岗、潘非、肖航、王泽民开会，通报了上午王揖说的情况。听者非常紧张，纷纷议论说吴冷西可能已经犯下严重错误，他的错误就是报社的错误。



◇ 陈伯达点名批评吴冷西

5月21日，人民日报社举行编委扩大会议，吴冷西作了检讨。他在一开始就对与会者说：“在这次批评吴晗的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首先，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我并没有把它看做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的开始，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学术讨论。”

吴冷西说，他在两个问题上存在思想抵触。一是认为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等来批判，说服力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连同《海瑞骂皇帝》等戏一起批判的话，会牵连到《人民日报》和胡乔木。

吴冷西在检讨中违心地批判了彭真，说自己“特别感到沉重的是，对彭这样的阴谋家，一直未识破。对他拉拢我警惕性很差，存在着成为彭的反党工具的危险”。

然而，吴冷西此时的检查已经挽救不了自己在“文革”风暴中的政治命运了。

5月23日，陈伯达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一开始，陈伯达的语气还缓和，他对吴冷西说：“你啊，千虑一失，但是往往失的这一点很重要。千虑一失，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陈伯达说：“《人民日报》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不服气是不好的，是政治问题。你不挂帅，别人挂帅，应该表示欢迎。”

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接着，陈伯达宣布，从现在起，解除吴冷西对首都各报的领导权。

吴冷西沉默了，知道再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

倒是胡绩伟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随后主持召开的《人民日报》编委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为吴冷西打气：“当我们这只船在大风大浪中，我们千万要沉着，不然会翻船。特别希望我们的掌舵人冷西同志要沉着。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要沉着。工作千万不能急，但是千万不能拖。工作还要适当安排。”

1966年5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吴冷西作了长篇检查，检讨自己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一直到现在，《人民日报》这里面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我的错误”。吴冷西在这个检查中主要是想摆脱和彭真的关系，结果越说越说不明白。

吴冷西检查之后，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走到前台讲话，心情十分沉重。他说：

现在，编辑部处于比较乱的情况下，由于编委会吴冷西同志说的，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章法乱了，在这场斗争中犯了错误以后，并没有很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起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戴罪立功，把工作做好，反而在严重斗争面前自己失掉了章法，使得编委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领导力量，因此编辑部同志们很焦急，有力气无处使，结果越焦急越乱，越犯错误……

《人民日报》的错误，我们大家都有份，但最主要是冷西同志，因为中央委托他来领导人

民日报社。现在，中央还没撤他的职，中央、伯达同志还这样鼓励他，勉励他，关键在他能够深刻认识错误，勇敢地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胡绩伟仍然对吴冷西寄予希望，要求全体人员支持吴冷西。他说：“中央同志、钓鱼台同志一直感到冷西检讨不深刻。认识错误一不深刻，改正错误勇气就不足，今天听他的检讨也有这个感觉。这就要大家帮助冷西同志革命，真正革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人民日报》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大家起来革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这是最主要的。要动员报社全体同志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

说到这里，胡绩伟说了一句在当时很有名、随后大有争议也叫自己吃了苦头的话。他说，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仍然具有核心地位，“只要他这一杆旗帜站起来，编委会和编辑部其他问题就好办”。此话一出，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批判胡绩伟的时候，这句话就成了他“保旗派”的铁证，批了个没完没了。

#### ◇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

1966年5月29日，鉴于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聂元梓等7人署名的大字报和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严重不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接管那里的领导。商定后，周恩来当场拿起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马上获得同意。实际上，刘、周、邓事先已经看出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打这个电话主要起“确认”的作用。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希望将“确认”一事留在历史的档案里。第二天，刘少奇起草了向毛泽东的请示信，并和周恩来、邓小平联署。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

信末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除陈伯达率队外，这些成员是：穆欣（光明日报社总编辑）、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毛泽东于当天深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共中央名义派出的唯一一个工作组。

#### ◇ 中央工作组的集结和出发

1966年5月31日，对人民日报社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日子。早晨，陈伯达在钓鱼台8号楼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

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陈伯达还宣布，下午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工作组进驻的决定。陈伯达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他宣布，第二天（即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陈伯达决定即由钱抵千负责起草初稿，社论的宗旨和基调就是刚才他讲话的精神。陈伯达要求先整理出自己刚才的讲话作为社论内容，当晚改定，第二天见报。

当天下午，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北京各大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到会。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也参加了。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他当场宣布了工作组人员名单，并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邓小平解释了向人民日报社派驻工作组的原因。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的。外电说，现在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人民日报》的错误不同于《北京日报》，吴冷西的问题不同于姚溱、许立群。《人民日报》不要把自己置于《北京日报》的位置。他还说：“《人民日报》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主要是中央的领导，但你们也是有份的。”

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最后，邓小平要求首都各报都要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他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工作做好。“对《人民日报》要内攻外帮。《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应该帮助《人民日报》。”

接下来，康生作了将近一小时的长篇讲话。他说，《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是代表党、代表中央的。去年11月以来，《人民日报》的威信日益下降，编辑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因此，要派工作组进去。

康生批评了吴冷西，说他歪曲转达“最高指示”，美化自己。

康生除了强调宣传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外，又一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删节了《解放军报》的社论。他说，要追问这是何种居心。

康生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

工作组组长陈伯达讲话说，工作组要帮助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办好报纸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的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工作，三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陈伯达针对邓小平的话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袋，人也要换掉。

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陈伯达来不及在会议上再多说什么，即率领工作组登车前往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

□ 《党史博览》2010年第8期

~~~~~

【读史论衡】

道德原则冲突下的囚徒困境
——帕米拉·路拜尔《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大革命”：
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评介

• 董国强 •

提起“文革”期间发生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许多人或许并不感到陌生。但是要讲清楚这个事件的原委以及含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国内媒体对此事件的叙述和诠释，包括许多当事人“平反”以后发表的回忆文章，都不超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的轨范。其核心观点是：这一事件是“中央文革”康生等一班人策动和利用红卫兵造反派制造的一个冤假错案，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

上述文件和论著对“六十一人案件”的描述和定性无疑是基本正确的。问题在于这个解释框架似乎过于简单，缺乏必要的思想底蕴和理论深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帕米拉·路拜尔（Pamela Lubell）所著《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大革命”：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the Sixty-One Renegades）一书无疑是一块他山之石。

帕米拉·路拜尔是一位以色列籍青年学者，曾先后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和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2002年由圣·安东尼学院和佩尔格瑞姆国际出版公司（Palgrave）联合出版。

在这本近260页（正文近200页）的英文著述中，作者依据大量文史资料和研究资讯（近400种），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为主要代表，系统考察了他们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他们1930年前后被捕的详情，他们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英勇表现，他们1936年出狱的经过，他们出狱后至“文革”前的主要活动及其在党政领导机构中的任职情况，他们在“文革”中被作为“叛徒”打倒的经过，以及他们最终获得平反的曲折过程。从微观实证研究的角度看，该书无疑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案件及其涉案人员的最为翔实的历史记录。

更为重要的是，在努力复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并回答了以下几个其他人没有提及的问题：这批人当年是奉中共华北局的指示，以签署“反共启事”的方式从草岚子监狱获得释放的。而华北局的这个动作事先得到中央的批准。因此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和中共“七大”代表资格审查期间，党组织对这批人1936年出狱问题做出了“服从组织决定，个人不负责任”的结论。然而为什么这些重要的审查结论只是分散地保留在各个当事人的个人档案里，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正式文件存入中央档案？其次、为什么1966年秋冬南开红卫兵造反派

向中央反映刘澜涛、赵林等人的“叛徒”问题时，主持大局的周恩来只是含糊其辞地强调中央知道这些情况，要求红卫兵不要公开扩散调查材料，而没有将当年中央和华北局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况和盘托出？第三、为什么在“林彪事件”以后和“四人帮”倒台以后，许多老干部纷纷复出，而“六十一人”的几次申诉都石沉大海，一直拖到1978年底才得以解决？

作者认为，这个冤案在“文革”期间发生，首先与毛泽东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打倒刘少奇——有关。因此尽管周恩来、康生等人明知这批人1936年出狱的真实详情，却没有公开出面加以澄清。作为这个冤案的始作俑者，康生的表现尤为恶劣。他不但暗中怂恿南开红卫兵追查所谓“叛徒”问题，而且通过专案人员向同样知道内情的张闻天（当年的中共总书记）施加压力，阻止他公布事实真相的努力。

然而，仅仅从“权力斗争”和“阴谋论”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如果将上面提到的三个疑问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六十一人案件”的涉案人员不仅是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且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社会道德观念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树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长期以来一直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关于“党”和“革命”的神话。这个神话完全屏蔽了历史真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斗争中，党也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许多党员同志也可能发生动摇或叛变。伴随这种神话而来的，是逐渐形成一套带有显著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绝对化倾向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结果有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政策和策略，便在日后遭到一些不了解历史内情的人们的质疑。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如此。作者认为纵观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的一生，他们无疑都是坚定果敢的共产党员。他们在1930年前后大批被捕，与当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有关。而他们1936年前后以签署“反共启事”方式出狱，则是党组织根据抗战的现实需要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实现的背景所作出的决策。就个人而言，他们在1936年“出狱”问题上面临一种两难抉择：从抽象的道德标准出发，他们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持革命气节，拒绝以这种屈辱的方式出狱；而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们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尊重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服从这样的组织决定，比起坚持狱内斗争乃至牺牲个人性命，需要更大的勇气，表现出更大的忠诚。

正因为党内高层意识到党组织在他们被捕与出狱问题上的责任，因此这批人出狱以后依然得到党的信任，后来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如薄一波曾担任过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安子文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刘澜涛担任过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杨献珍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导致他们被捕的“左”倾路线错误和解救他们出狱的权宜方式，与公开宣传中一再强调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形象相抵牾，因此这个问题的处理应该尽量淡化，最好是不留痕迹。所以在延安整风和“七大”代表资格审查时，才采取了那样一种变通的做法。而且在此后的党内历史叙事和个人履历记载中，这批人的出狱都被简化为“出狱”、“经组织营救出狱”或“履行出狱手续”。

这种含糊其辞的做法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这批人对党的忠诚，另一方面又巧妙化解了党组织（包括华北局和中央）应该承担的责任，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办法。然而这种办法之所以奏效，是以党组织和各当事人之间的相互默契为重要前提的。“文革”动乱发生以后，一方面是毛泽东、康生等人存心要置这批人于死地，另一方面是历史真实与业已形成的社会道德观念之间的巨大反差，因此知道内情的周恩来无论是从对毛泽东的个人效忠出发，还是从维护“党”和“革命”的神话体系出发，都不可能正面回应南开红卫兵提出的质疑。结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决策，在“文革”当下却成了一个无法饶恕的罪行；一批无限忠于党的事

业的高级干部，被无端打成“叛徒”遭到整肃。

作者还指出，这个重大冤案之所以拖到1978年底才得到解决，可以看出固有社会道德观念转变之难。而且从平反冤假错案高潮期间的主流话看，旧的“禁忌”意识并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了不少重大冤假错案，却不包括“六十一人案件”。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出，该书从社会道德观念形成及其现实影响的层面出发，阐释了“革命伦理”在“六十一人案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无疑为我们深入解读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维度。然而在充分肯定这本书的创新尝试的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指出该书的一个致命缺陷。

作者研究“六十一人案件”，其主要着眼点并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从该书的标题——《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大革命”：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可以看出，他是希望通过对这个事件的深入考察，揭示“文革”发生的基本动力。就这一点而言，作者的认知框架（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和主要争议（fundamental argument）是相当偏颇的。

如作者所述，本书的创作灵感最初来源于高岗当年关于“红区党”和“白区党”的评论。以此为出发点，作者在“序言”中花了相当的篇幅去分析“红区党”与“白区党”在社会构成、生存环境、工作特点和道德准则方面的一些显著差异。笔者认为这些分析带有相当的创新性和一定的事实基础。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文革”的本质是所谓“红区党”和“白区党”的派性冲突，则显得非常牵强附会。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反证：

第一，就笔者所知，党组织有意识、有计划地大规模清洗“地下党”，主要发生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不过这些运动的清洗对象多为中下层干部和普通党员，并不包括像“六十一人”这样的高级干部。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延安“抢救”运动的情形与此类似。在那次“抢救”运动中，薄一波等来自“白区”的领导干部都是运动的“动力”而非“对象”。

第二，自中共建立以后，党内高层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就以解放后的几次大的党内斗争——如1953年前后的“高饶事件”、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1962年的“习仲勋、贾拓夫事件”等——看，似乎都很难从“红区党”、“白区党”的角度去加以解释。即使从“文革”期间的斗争看，如果说打倒刘少奇与作者的解释框架吻合，那么打倒邓小平和后来的“林彪事件”则都是溢出这个框架之外的。换言之，纵观解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我们既可以看到“白区”干部受到信用，也可以看到“红区”干部受到整肃。所谓“区”籍系统与政治清洗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那么导致“文革”（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几次党内斗争）的基本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以后的若干反思言论是非常正确的。其基本观点是：这些斗争的发生多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家长制”作风残余的影响，使得党内民主集中制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结果每当政治危机出现的时候，不同政见往往被毛泽东看作是对其个人权威的质疑或挑战。而毛泽东的猜忌最终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清洗。这种解释在整肃彭德怀和刘少奇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都是在“大跃进”以后流露出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而先后遭到清洗的。

以这样一种思路重新解读该书所提供的那些史实，对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被清洗的问题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除了受到刘少奇问题的株连外，其实薄一波、杨献珍等人早有“前科”：薄一波在“大跃进”以后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党内许多比较务实的干部相一致；杨献珍则因在有关“矛盾关系”的哲学命题上触怒龙颜，早在1963年已经受到公开批判。由此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红区”、“白区”，而在于你是否无条件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 《二十一世纪》 香港中文大学 2010年4月号

~~~~~  
【书 评】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 舒 崇 •

去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上下两册、1000多页的大部头《新发现的周恩来》。作者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二人都是民间学者，对文化革命问题，尤其是对周恩来问题长期关注。固然，由于作者的民间身份，这本书并没有披露什么鲜为人知的独家机密或宫廷秘闻。所谓“新发现”，并不是有了什么惊人的新材料。两位作者无非是对已经公布的各种材料广泛收集，对照梳理，对周恩来其人做了一番比较细致比较全面的描述而已；但就是作者的这一番重新描述，就彻底颠覆了以往一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的形象。只要你认真读完这本书，你对周恩来的印象就会大大改变。

《新发现的周恩来》这本书涉及的问题很多，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谈两点。

◇ 关于清查“五一六”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首都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该组织出现于1967年8月1日，8月11日就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而遭到镇压，土崩瓦解。照理说，“五一六”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直到今天也没宣布平反。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周和毛、和中央文革通力合作，共同实行的。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有些人总说，周虽然参与了多次政治迫害运动，但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不对，清查“五一六”就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

顺便一提，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它称作鼓励群众造反，反对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伟大创举。可是，他们怎么解释清查五一六运动呢？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它发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把这场运动再挂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事实上，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

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 周有没有自己的思想

在“后记”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周到底是没有思想还是隐藏得太深以致外人都看不透？”作者的回答是：“周恩来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

对于作者的这个论断，我不妨代为解释几句。如果我们把“思想”定义为一个人投身政治所力图实现的一系列理念；他是为了实现这套理念才去从政、去争取权力的；在这里，权力是手段，理念是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周是没有思想的；假如周在从政之初还心怀若干理念的话，那么越到后来，这些理念就越被腐蚀被放弃，越来越无足轻重了，而权力本身则成为了目标。对于周，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第一位的，而实现自己的理念则是第二位的。周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假如毛死在前头，周接掌最高权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实行不同的政策。又假如刘少奇或林彪取代毛掌了大权并愿意继续任用周，我们也很可以相信，周同样可以扮演好总理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周只是个事务主义者，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因为周之放弃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体制、被毛逼的。这不等于是给周开脱。因为，顺从是要有底线的。另外，周不止是体制的受害者，周首先是体制的缔造者。在评价周恩来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 《北京之春》 2010年第9期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二十）

• 舒 云 •

98、是谁制造了张春桥这个“大诱饵”？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因为黄永胜在来北京任职前就在会议上公开批评过江青，江青怀恨在心。“九大”以后，她和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江青无理取闹，阻止黄永胜出国访问。因毛泽东出面干预，黄永胜才如期带团出国。

奇怪的是，这之后江青似乎缩回去了，张春桥倒“横空出世”。

1970年3月13日晚上，周恩来遵照毛泽东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成立了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周恩来牵头，组员有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还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组员有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经毛泽东同意，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由宪法修改小组研究。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为什么还要让宪法修改小组讨论？这一讨论不就“钓鱼”了嘛？问题是有的讨论者并不知道，糊里糊涂上了钩。

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会议室开始讨论了。据吴法宪回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逐渐形成两派，陈伯达、我、李作鹏是一派，康生、张春桥是一派。尤其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争论更加激烈。尽管当时矛盾很大，但还算正常进行，甚至依据“九大”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

4月14日下午，李作鹏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办事去了，纪登奎也因事没来。会议参加者只有四个人，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双方各半。到底设不设国家主席，又是一场激烈争论，势均力敌。最后康生说，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最主要的矛盾上交了，应该和平共处了吧？接着讨论国家机构，吴法宪提出：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康生和张春桥坚决反对，说再写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吴法宪回忆：其实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当时张春桥的几句话引起我的反感。这时陈伯达出去打电话，张春桥抓住机会，不紧不慢地说：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在当时那种“红海洋”的气候下，要是普通老百姓说这几句非常反动的话，非抓起来枪毙不可。为什么张春桥如此胆大包天？当然，如果书生陈伯达在，可能会注意到张春桥话中的某些细节，想一想张春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打死他也不敢。可是陈伯达不早不晚躲出去了。张春桥相信，吴法宪这个“大老粗”肯定爆炸，所以张春桥就“开炮”了。

果然，吴法宪气得发抖，无名火一下冲到脑门上。“三个副词”是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话，张春桥竟敢否定？吴法宪认为张春桥不仅讽刺了他，也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没有多想，吴法宪大声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份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吴法宪哪里想到，他的悲剧，林彪的悲剧由此开始。

现在看，张春桥绝对是故意的，或许是鹦鹉学舌？林彪和黄李邱，个个谨小慎微，夹着尾巴，也都有头脑。相比之下，吴法宪是个会咬钩的“鱼”。而吴法宪认为他一通上纲上线，也把张春桥吓了一跳，谁不怕被打倒？张春桥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吴法宪更加激动，问毛主席在哪里说的？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语塞，他拿不准，把毛泽东“卖”出去，对自己有利还是无利。吴法宪觉得占了理，更加大声地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越刮越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个大帽子太大了，康生立即合稀泥，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吴法宪说：我是个人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成员，我要提出个人意见。

会场上吵得热火朝天，陈伯达打完电话，磨磨蹭蹭不敢进来。等会场平静了，陈伯达才慢慢走进来，吴法宪埋怨陈伯达关键时刻不在，陈伯达小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吴法宪气鼓鼓的，不再说一句话，陈伯达也不说话，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最后一次讨论就这样“一边倒”结束了。会后，吴法宪迫不及待报告了林彪、周恩来和黄永胜，他们三人都支持他。头脑简单的叶群甚至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尾巴。

张春桥的话太不简单了，他是鹦鹉学舌，所以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林彪。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意思，给他装上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策略，他一定把手下分成两帮，他们争斗，他就可稳坐钓鱼台。否则他们联合，矛头就冲上了。

8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准备的文件。首先审议宪法修改草案，吴法宪他们几个人都没有想到，设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也没有讲。所有的文件都顺利通过，一场“暴风雨”就这样过去了。

林彪认为，庐山会议上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但是，庐山上张春桥依然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活跃极了。8月20日，东道主程世清对吴法宪说，昨天毛主席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说，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原来“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出处在这里。吴法宪被关起来后却移植到叶群头上，成了林彪篡党夺权的主要罪证。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更正，说那是被逼供信逼的。当时，吴法宪听到程世清讲的汪东兴这话，非常高兴，因为他也亲耳听过汪东这样说。吴法宪认为这肯定是毛泽东的意思，汪东兴不敢假传圣旨。不过，吴法宪至死也不可能想到，张春桥成了“大诱饵”，汪东兴也成了“大诱饵”。不仅要钓他这条“胖鱼”，还要钓林彪这条“瘦鱼”。

张春桥在“三人会”上说的那一番反动话，钓出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长篇讲话，钓出华北组第六号简报，钓出陈伯达，钓出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最后钓出了林彪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

99、毛泽东为什么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1970年庐山会议上，在几乎一边倒讨伐张春桥的声浪中，历史惊现了1959年庐山会议。但是，在报纸上公布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却显示风平浪静，其中有一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没有像面对面撤掉彭德怀一样，撤掉林彪，而是不动声色，把矛头指向了陈伯达。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首先说“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最后毛泽东又故意写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所有看过的人都会认为，毛泽东要揪出陈伯达了，而林彪仍然是毛泽东的铁杆同盟者。可谁能想到，毛泽东揪陈伯达实是揪林彪的前奏。现在想，毛泽东是一石二“鸟”，对陈伯达实是“惊”，对林彪和林彪同伙（不包括黄吴叶李邱）则是“安抚”。因为没有揪出林彪的意思，林彪同伙会继续活动，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小辫子”。

其实，仔细回味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有一句是冲着林彪的，那就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或许林彪深得其味？他几次请求面见毛泽东，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关系，并求得毛泽东宽恕。但毛泽东像当初打倒刘少奇、罗瑞卿等人一样，拒绝见林彪，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林彪明白毛泽东是把他当成敌人了。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怎么是说林彪呢？

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又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原来空军才能炸平庐山。

这个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典故”，出自庐山上正在修建的小机场。

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隆隆炸石头，时任江西省委负责人的程世清事先

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我。我问，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我又问，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想，命令是前天收到的。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我当时没有答复他。回到杭州，我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问，谁下的命令呀？我说不知道。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我打电话给周总理，他也说不知道。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总理说，我问一下。他问了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他知道这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走盘山路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周总理对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没说什么，点了一下头。

庐山上修直升机场，林彪知不知道？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叶群会说林彪知道。林彪身体不好，许多事情要叶群出面，林彪的意见、指示、批示都要由叶群把关。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请示、婉言谢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

所以，林彪到底知不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很难说。在“太岁”头上修机场，非同小可。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按照他的“原则”，他一定要请示毛泽东。现在看，林彪知道的可能性很小。从现有资料看，机场一点点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为了政变吗？没有证据。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激化。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庐山会议以后，1971年3月的事情。

100、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有什么错？

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国家元首？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施政需要。在中国，党领导一切，国家主席没有什么实权，主要是用于外交。国际交往讲究对等，人家国家元首来了，党主席或者国务院总理去迎接，显然不合适。国家主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就有，刚开始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提出设置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打倒，恨“乌”及“屋”，甚至连国家主席这个“屋”也成了“洪水猛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才重新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延续至今。

从这段历史看，设国家主席在中国也顺理成章，根本没错！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上庐山前，他提到过，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的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当时议论让董（必武）老当国家主席。在下午和晚上的小组会上，林彪讲话得到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欢迎，上庐山的255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中將黃志勇說，我在西南組，我們都希望主席當國家主席，最後聽主席定。我們召集人是譚甫仁和吳法憲，聶帥、李先念都在我們組，沒有什麼激進的人，我們好像挺平靜。

林彪不管是当接班人前，还是接班人后，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都是毛泽东画圈我画圈。林彪秘书张云生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林彪对中央处理重大问题时的独自表态与毛

泽东指示有抵触之处。他反对过于突出自己，“副统帅”、“三忠于的光辉榜样”，他都要秘书一律划掉。而且几次说，不能出版《林彪语录》，出版的要一律没收。

在同意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林彪要看毛泽东的态度，所以叶群从汪东兴那里摸底。叶群与汪东兴的关系非常密切，汪东兴胃大出血，儿女当兵，叶群都忙前忙后。汪东兴肯定毛泽东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对林彪说，谁要设谁去当，反正我不当，我劝你也不要当。这表明，虽然毛泽东说了好几次不当国家主席，但直到庐山会议上，他仍然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的“忠诚卫士”汪东兴怎么可能在小组会上带头提出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与毛泽东唱反调？1970年8月24日下午，汪东兴在华北组说，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还要说明的是，在华北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议林彪当国家主席。奇怪的是，毛泽东大骂陈伯达，却不对汪东兴发怒，只让他写了一个检查。为什么汪东兴写个检讨就过了关？而陈伯达却被打倒？无理可讲。

中将曾思玉说：他是第一次看见毛泽东震怒。庐山会议第三天，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组的第一召集人，曾思玉作为中南组第一召集人参加。毛泽东把桌子拍得山响，非常严厉地批陈伯达，说我们共事30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变色龙！我毛泽东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当好了，你们去当！当时陈伯达的脸涨得紫红，一句话也没说。这之后，陈伯达就被“监管”了。他悲凉地说，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上庐山了。

谁要设国家主席，谁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

林彪向毛泽东表态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那么他是不是想当国家主席呢？林彪不是不知道国家主席只是一个空架子，又主要是递交国书等外事活动。而这正是林彪最厌恶的事情，林彪特别不喜欢与外国人打交道，这话他同李文普等人说过。1968年10月，林彪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巴卢库和他热烈拥抱，林彪回来后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更何况他的身体太差，有时走路都走不了，怎么可能胜任繁重的外事活动？关于选上林彪当接班人，关光烈曾问过李文普，首长愿意不愿意？李文普说，你还不知道？他没那么大的官瘾。李文普说，我没听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话。但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当“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

本来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具体问题，提建议、酝酿、讨论，都无可非议。党史专家王年一说，在党的会议上，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个党的副主席，为什么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意见对也罢，错也罢，为什么不由全会作出讨论作出判断？极而言之，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党的一个副主席，想当国家主席，为什么就算“反党”、“反革命”？更何况林彪根本不想当。看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一个典型的“欲加之罪”。

101、“林彪第一个号令”为什么没上“两案”起诉书？

“林彪第一个号令”是林彪案中的重要证据之一。为什么从“两案”起诉书中拿掉？

198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中央大事年表》，第一次为“第一个号令”正名，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而作出的指示。1989

年9月，中共党史专家苏采青在《中共党史研究》撰文，说明“第一个号令”不包括疏散中国党政军领导人这项任务。这是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安排，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边防军吃了亏。8月，苏联边防军报复，偷袭了在中国新疆伊犁地区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造成重大伤亡。两国关系恶化到极点。苏联在苏中边境上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关于中苏关系，苏联分成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以柯西金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他们主张谈判。柯西金几次想接触中国总理周恩来，阴差阳错，没有搭上话，急得团团转。最后总算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双方派副外长级的代表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约定10月20日，苏联谈判代表团到中国北京。

事后看，苏联不想和中国打仗，是诚心诚意的。但是，事前中国极不放心，1968年刚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苏联借口谈判，占领了捷克的机场，从而控制了整个捷克。中国极担心捷克事件在中国重演，尤其是10月20日苏联政府边境谈判代表团到北京的那一天，北京更是紧张万分。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到了外地。甚至林彪下令，机场四周要埋伏部队，准备大棒子肉搏，决不能让苏联人占领机场。

1969年国庆节，是中国的20年大庆，照样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阅兵。虽然中国领导人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是中国生怕苏联发射原子弹，在天安门城楼后面停放着一架直升机，随时载走中国领导人。事后看，中苏战争虽然没爆发，但不能说战备就错了。珍宝岛战役后，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而且已经把原子弹对准中国的北京等大城市，确实是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能不战备吗？敢不战备吗？你高枕无忧，万一战争来了，哭都来不及。国庆节后，毛泽东下令：除周恩来西山主持战备外，其他所有领导人，包括被打倒的领导人，全部疏散到外地。毛泽东到了武汉，林彪随后到了苏州。北京只有周恩来和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留守，而他们也进了西山。因为林彪“疏散”到苏州，总参机要局去了电台班子。六部电话，还装有通往北京的红机子，夜晚也响个不停。总参作战部和国务院都是两套班子：前指和后指。当时各单位还要疏散家属子女，后来形势缓和，才算了。

10月18日，林彪到达苏州的第二天下午，叫秘书张云生给总参谋长黄永胜打电话，口授了加强战备的四条指示，同时叶群电话里报告了毛泽东秘书。黄永胜在当晚19时布置给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因为针对不同兵种，指示略有不同，所以不止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阎仲川为了传达和查询方便，将林副主席指示编为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作战组用电话下达全军。

紧急战备是毛泽东搞的，全军战备疏散是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只不过是“传声筒”而已。毛泽东是军委主席，再借林彪几个胆子，也不敢擅自发布什么号令，更不敢搞“第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听到“第一个号令”说“烧掉”，而没说收回的原因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执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直到一个多月后，部队纷纷请示是不是回营房，林彪才想起大批的部队还在野外挨冻，下令班师回营。如果毛泽东认为林彪篡党夺权，他一声令下，就可以让全军立即回营，为什么还继续执行疏散？叶群以为毛泽东“烧掉”是保密，其实毛泽东是不满，不是对内容不满。内容是毛泽东的意思，他不会对自己不满，他不满意的是“第一个号令”这个标题。阎仲川调到总参谋部的时间不久，不懂得“一号”的重大意义，那是毛泽东独有的“称号”，毛泽东的卫队是第一中队，毛泽东在各地住的楼是一号楼，别人怎么能冠以“第一”？毛泽东得知后很不高兴，说“烧掉”。他反感的只是“第一个号令”的“第一”，谁能发布第一个号令？应该还是他统帅毛泽东自己嘛，怎么能是你林彪？你林彪怎么能发布“第一个号令”？这不是篡权吗？全部症结就在这里。不能不承认，由于这个“第一个号令”，本来就疑心多多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怀疑林彪在阴谋政变。

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成了林彪的“大阴谋”，说林彪借口战备，背着毛泽东擅自发布的，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于是，总参包括阎仲川在内的“第一个号令”执行者蒙受不白之冤，成为“专政对象”。“第一个号令”之前的战备疏散，也被当作“脏水”泼到“第一个号令”的头上，说是“第一个号令”迫害老干部，把他们赶出北京。

到1980年审理“两案”，关于“第一个号令”分歧很大。海军说是“阴谋”，总参作战部认为不是“阴谋”，是正常加强战备。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孙玉恒带本部的8个人，分头回忆，大家讲的没有什么出入。当时中央军委的战备电报，没抄送江青，江青还大发脾气，专门查过。总政“两案”取证组专门调出总参作战部的作战日志，一页一页他细看。记得清清楚楚。经手的人很多，完全正常的工作程序，几分几秒，谁下的命令，传达给谁的，从上到下，全是按组织系统，不存在搞阴谋的问题。

总政取证组认为：这个事太大，不是哪一个人能处理得了的。中苏紧张，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有毛泽东划圈。那么，“第一号令”是不是阴谋？是不是夺军权？定不了。总政也觉得不好处理，最后上报，由“两案”总负责人彭真拍板，定不住，去掉！

“第一个号令”的罪名就这样从林彪头上拿掉了。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